

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分析

國際關係研究所學術座談會發言紀要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本年四月十二日下午三時至六時，在臺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七樓會議室，舉行第十六次學術座談會，討論「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問題。座談會係由所主任吳俊才教授主持，應邀出席的有：（以簽名為序）王作榮、孫桂籍、嚴靈峰、尹慶耀、雷崧生、周之鳴、明驥、馮達、關素質、夏忠茂、魏守嶽、郭乾輝、鄒宇光、王撫洲、朱少先、陳澤普、丁懋慈、王啓升、何浩若、周鑫、趙倩、畢英賢等廿二人。茲依當天發言先後，將要點刊載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主席報告：

今天是本所第十六次學術座談會，討論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關於這個問題，在座的諸位先生平時都有深入的研究。這次座談會討論的主要目的是在探討這次大會對俄共基本路線、組織、制度、乃至於入對這個問題得到一個比較有系統的和正確的瞭解。今天能夠請到在座的諸位專家先生們參加，我們非常感謝。在未請各位先生發言之前，我們準備了三個報告。第一個是「俄共黨的組織問題」，由關素質先生報告；第二是「新五年計劃」，本來是由呂律先生報告的，因為呂先生抱病，由本所楊允琪小姐宣讀他的講稿。第三是請孫桂籍先生就「俄共對外政策」為我們作一個扼要的報告。在他們報告之後，希望在座的專家先生們都能有寶貴的意見提出。

關素質先生：

俄共黨的組織問題

據俄共第二十三屆代表大會資格審查委員會卡比托諾夫報告，俄共現共有黨員一千一百六十七萬三千六百七十六人，候補黨員七十九萬七千四百零三人。

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分析

出席大會代表共四九四三名（有表決權代表四六二〇名，有發言權之代表三二三名，有表決權之代表有一名因故未出席），最大的黨組織所選出的代表人數：莫斯科首都三一一名，列寧格勒省一八七名，莫斯科省一五四名，羅斯托夫省九一名，哥爾基省八三名，克拉斯諾達爾邊區八三名，斯維爾達洛夫斯克省八一名。十四共和國出席代表人數：烏克蘭八四七名，哈薩克二〇四名，白俄羅斯一五八名，烏茲別克一四〇名，喬治亞一一一名，阿塞爾拜疆九二名，拉脫維亞四八名，亞美尼亞四七名，立陶宛四二名，莫爾達維

亞四〇名，吉爾吉斯三八名，土庫曼三〇名，塔吉克三〇名，愛沙尼亞二七名。代表中有五九種民族。

大會主席團六九名，秘書處二五名，大會編輯委員會一九名，資格審查委員會四一名。

大會第一天發言者：第一名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葉哥里切夫，第二名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謝列斯托，第三名列寧格勒省黨部第一書記托爾斯且柯夫，第四名哈薩克黨中央第一書記庫那耶夫，第五名諾伏西比利爾斯克省黨部第一書記哥爾雅切夫，第六名烏茲別克黨中央第一書記拉西多夫，第七名白俄羅斯黨中央第一書記馬歇洛夫，第八名喬治亞黨中央第一書記姆沙哈瓦那澤。附庸共黨在大會上第一天發言者第一名波共中央第一書記戈慕卡，第二名東德共黨中央第一書記烏布利希，第三名北越勞動中央第一書記黎笋。

布里茲涅夫報告中第四部份「在共產主義建設中的領導作用」，有關黨章修改提出下列幾點：（一）俄共中央主席團改為「政治局」，（二）撤銷俄共中央俄羅斯聯邦局，（三）恢復全蘇黨的代表會議，（四）黨章中規定選舉機關按黨綱中所規定的原則適宜的予以保留，至於由基層到中央規定每屆選舉時硬性規定成員更換幾分之幾等，則予以撤銷。

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葉哥里切夫在大會上第一天發言中建議，由俄共中央第一書記改為「總書記」。

俄共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莫拉維耶娃報告中指出，黨的經費大部份用於訓練幹部及黨的宣傳方面，從俄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一九六一年）到俄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期間，關於訓練黨幹有下列成果：

（一）在俄共中央社會科學研究院，俄共中央高級黨校，俄共中央函授高級黨校，十一個共和國所設立的高級黨校，二十二間訓練蘇維埃工作人員及黨的幹部之黨校，以及各省所設立的高級黨校，在這四年以來共訓練黨幹及蘇維埃工作人員共計三萬二千三百人。

（二）最近數年以來，曾設立三零六間馬列主義夜間大學，共計培養宣傳員二十四萬八千人。

（三）黨的經費用於舉辦邊區、省、市、區委員會中之政治教育研究室

及俱樂部共計一千個以上，在大的國營農場及集體農莊中舉辦六百個政治教育研究室，其次並設立黨的短期訓練班，以及宣傳幹部研究班（課堂討論）。

在俄共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到第二十三屆代表大會黨的宣傳費用增加到百分之四三點二，黨的報紙發行增加一倍半，黨出版的雜誌增加到二倍。

（一）「真理報」（俄共黨的機關報），最近四年來，每日出版份數從六百萬份增加到七百萬份，「共青團真理報」（團的機關報），每日出版數量從三百三十萬份增加到六百四十萬份，「農工生活報」，每日發行從九十萬份，增加到六百二十萬份；黨出版的雜誌「共產黨人」雜誌，「黨的生活」雜誌，「宣傳員雜誌」，「政治自修雜誌」，每期從一百九十萬冊，增加到三百七十萬冊。「女工雜誌」每期從二百四十萬冊，增加到一千萬冊，「農民雜誌」每期從二百二十萬冊，增加到四百七十萬冊。

（二）黨訓練羣衆之報紙、刊物及書籍：現共出版大小報紙七千七百種，每日發行七千四百萬份，出版雜誌四千種，每年出版書籍十億四千冊。代表大會選出新中委一九五名（上屆一七五名），新候補中委一六五名（上屆一五五名），新檢委七九名（上屆六五名）。

二五名新選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及書記之人事特點：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新中央全會選出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十一名，政治局候補委員八名，俄共中央總書記一名，書記十名。

十一名政治局委員：○布里茲涅夫俄共中央總書記兼政治局委員，○沃洛諾夫政治局委員（原任俄羅斯部長會議主席），○基里林科政治局委員，兼俄共中央書記（主管俄羅斯黨務），○柯錫金政治局委員（原任蘇俄部長會議主席），○馬祖洛夫政治局委員（原任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貝爾謝（新任）政治局委員兼俄共中央黨監察委員會主席，○包戈尼政治局委員（原任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波良斯基政治局委員（原任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蘇斯洛夫政治局委員兼俄共中央書記，○謝列平政治局委員兼俄共中央書記，○謝列斯托政治局委員（原任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

八名政治局候補委員：○格里辛政治局候補委員（原任全俄職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達米契夫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俄共中央書記（原任俄共中央

思想理論委員會主席)，③庫那耶夫（新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原任哈薩克黨中央第一書記），④馬雪洛夫（新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原任白俄羅斯黨中央第一書記），⑤姆沙哈瓦那澤政治局候補委員（原任喬治亞黨中央第一書記），⑥拉西多夫政治局候補委員（原任烏茲別克黨中央第一書記），⑦烏斯季諾夫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俄共中央書記，⑧謝爾比茨基政治局候補委員（原任烏克蘭部長會議主席）。

書記處書記十名，總書記一名：政治局委員兼總書記及書記者共四名（①總書記布里茲涅夫，②書記蘇斯洛夫，③書記謝列平，④書記基里林科），政治局候補委員兼書記者二名（①書記達米契夫，②書記烏斯季諾夫），另五名專職之書記：①書記安德洛波夫（主管附屬共黨及工人黨），②書記卡比托諾夫（主管黨的組織工作），③書記庫拉可夫（主管農業），④書記波諾馬廖夫（主管國際共黨），⑤書記魯達可夫（主管工業與建築）。

俄共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格·佛·西索夫（原任俄羅斯庫干省黨部第一書記十一年）。

以上二十五名領導階層人物中，俄共第二代人佔十四名，其中以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俄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包戈尼四巨頭為最有權力。

二十五名領導階層人物中，俄共第三代人佔十一名：其中政治局委員中佔三名：謝列平掌握共青团與特務，現任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之馬祖洛夫及波里斯基分掌工業與農業，政治局候補委員中佔六名：（格里辛主管全俄職工會，達米契夫主管思想理論，庫那耶夫掌握哈薩克中央第一書記，馬雪洛夫掌握白俄羅斯中央第一書記，拉西多夫掌握烏茲別克黨中央第一書記，謝爾比茨基主管烏克蘭部長會議主席），書記三名：卡比托諾夫（黨的組織），庫拉可夫（農業），魯達可夫（工業），俄共第三代人物在政治局、書記處已佔相當重要地位。

孫桂籍先生：

「俄共處境及其對外政策」引言

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分析

三月末的莫斯科初從漫長的嚴冬中甦醒，人們盼望溫暖，却更埋怨俄羅斯的春天脚步總是來的太慢。三月廿九日俄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前夕，莫斯科在陰雨與大霧中。天候的惡劣，影響班機降落。起來列席的法共代表，會一度中途折返華沙。白天，數以千計的來自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代表，羣結隊進百貨店，朝拜列寧墓，參觀博物館所點綴出的節日景色；入夜以後，却被大街上稀稀落落的五彩電燈牌坊因被雨打濕所發出的憂鬱光亮，而改變了氣氛。西方記者冷眼旁觀，認為一般人民，和俄共大小頭目迎接二十三次大會的表情，確有不同。美聯社記者報導：「民衆對於克里姆林宮一直不能兌現的諾言表現『不耐』，對於為共產主義建設而犧牲的號召『淡然無動於衷』；另一方面，取代了黑魯曉夫寶座的新貴，則對於俄共在國內和國際逐漸失去控制的趨勢，深感憂慮」。文藝作家對自由的呼喚，史達林幽靈復活的耳語運動，工業放鬆而農業失敗，被迫「和平共處」而軍備競賽不能不加強；歐洲局勢改變而「德國復仇主義威脅」增加，亞洲局勢緊張而毛共對「沒有黑魯曉夫的黑魯曉夫的挑戰」無法輕化，印尼和整個非洲大陸反共怒潮對轉形期國際共產運動的衝擊……說明，時代所加於蘇維埃帝國及其分崩離析的殖民地共產附庸體系的考驗是嚴重的。而事態嚴重程度的實質內涵，更遠超過表面上可用語文記述的若干外燦現象。中共周匪恩來最近形容俄共新領導的處境「如坐火山口」，固然是別居用心；波共第一書記戈慕卡說：「俄共第二十三次大會是『在充滿了歷史意義的風暴，和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時代裏，在國際局勢非常緊張的情形中舉行的』，則比較近似實際」。

十天的會議開完以後，大會初步給人的印象是「平淡無奇」，一切「率由舊章」。實際却不然！時代變了，人物換了；新的問題、新的困難、新的挑戰，紛至沓來。固然，對俄共廿三次大會所扮歷史角色作最後評價的時日，不在今天；但是至少有一點已經不成為問題，那就是在陳腐了的馬列主義詞彙中，已經再也找不出現成的語言，可用以說明並解答它所面臨的課題與困擾。制度的死結，使難題變得「欲治彌莽」，理念的中毒，使新一輩當權的人面貌改變，舌頭僵化。當年列寧是滿懷仇恨心、機智而勇敢的雄辯家，史達林陰險、武斷，黑魯曉夫粗獷、潑辣，都具有老布爾雪維克黨人浪漫主義的氣質，稟受有舊日俄國虛無主義瘋狂革命的精神傳統。如今，布里茲涅

夫、柯錫金，都是從處理事務累積的經驗中爬起來的，假如說他們也有理想，那是說他們一心要把俄國自沙皇地主時代沿用到今天的橡木大算盤，改換成美國的計算機。他們手裏雖然仍在高舉斧頭和鐮刀的徽號，作爲在廿世紀領導野蠻的共產部落的圖騰向全世界進軍，無奈貧血的頭腦却早已被人爲的核能分裂時代宇宙與星球的新景象所暈眩。他們的人格精神，已經發不出熱力，當全世界的共產黨徒，只有靠助長仇恨心，刺激行動的時候，莫斯科新貴們新功利主義的對外號召力，顯然只有誘人以利，不能再昧人以情，欺人以理了。

二

大會前夕，三月二十八日莫斯科廣播說：「一九〇三年蘇共第二次大會通過了第一個黨綱，任務是在蘇俄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一九六一年第二次大會通過了第二個黨綱，任務是在蘇俄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一九六一年第二次大會通過了第三個黨綱，任務是在蘇聯建立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與社會基礎。當前俄共和蘇聯政府，仍然就是在這一個目標下，決定着蘇聯的活動方向。列寧認爲把對羣衆革命運動的經驗、與實踐共產主義建設經驗二者，加以科學的綜合，發展馬克斯主義，是共產黨代表大會的首要工作。因此，如何在當代條件下，在國內和國際生活發生了極爲複雜並且極爲深刻變化的時候，黨代表大會對馬列主義的理論發表，意義格外重大。」——顯示會前俄共的宣傳機器，很想哄抬這次大會的身價；但會後，到目前已經過去四天，從蘇俄所發佈的文書資料中，那所謂「沒有黑魯曉夫的黑魯曉夫路線」，換了布里茲涅夫爲主角的主要特徵，只是「平實」二字。

但是我們萬不可以輕率地低估了以「平實」二字描繪第二十三次俄共代表大會風格與內容的實質意義；就事論事，就在這「平實」二字中已經見出跡象：（一）顯示，蘇維埃帝國蛻變過程，內在危機的尖銳化與深刻化，不僅未使它減少對自由世界的威脅，新的威脅且正方興未艾。（二）俄共新領導經歷了黑魯曉夫垮台以來一年另四個月的安排，已經初步建立起了新的權力平衡，正滿懷冒險「衝突時代苦難和風暴前進」的決心，雖然主觀上還沒有形成足夠的信心，和解決問題的新辦法。（三）但是，他們已決定：面對一切內外問題，一致採取一種試驗和試探的態度，一切「實

事求是」、「針對具體的情況，作具體的分析」、「積極的立刻去做那些當前所能做的事情」。——布里茲涅夫在大會閉幕時，表示對大會工作所表現的「現實主義的作風」認爲滿意。布里茲涅夫的言論和作風，顯出他所崇尚的「現實主義」，已經染有共產黨哲學所一直卑視的「美國帝國主義實證主義、和實驗主義」的成份。雖然他的頭腦缺乏理念的抽象力和整合力、創造力和超越事象的想像力；但是，他應付和解釋實際問題的邏輯頭腦，比較黑魯曉夫清晰、明白，比史達林的冷酷或尙不如，然而他有不頑固、能客觀與能虛心的長處。布里茲涅夫和柯錫金一派共產功利主義作風，從另一角度看，未始不是今天西方強權政治舊功利主義、以及姑息主義的一個嶄新的挑戰。難怪，開年以來，莫斯科冷戰攻勢的矛頭，瞄向巴黎和東京；更難怪毛共作垂死掙扎的最後賭注，把握蘇俄與美、法、英、日間合縱連橫勾心鬥角的新形勢，也押在了華盛頓左傾學人和參議院傅爾布來德等姑息主義者流的身上。

三

英共總書記高蘭說：「每一個共產黨都在具體的政治條件下行動，所以有時候對個別問題意見分歧；但是當前刻不容緩的任務，是對帝國主義採取一致的行動」。他的話，是針對俄共二十三次大會布里茲涅夫報告，格外強調國際共產集團分裂，爲世局緊張化——「帝國主義侵略性強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作的呼應，却又一次地間接揭發了一項久已衆所周知的事實：共產集團內部的分歧、衝突、權力地位鬥爭是一回事；由於它們一致敵對自由文化歷史發展的世界觀，無論各國共產黨暴力政權間它們彼此的關係如何，針對具體目標它們個別所展開的鬥爭縱然就全體看是不調和的，但是在時間與效果上却可以是互相配搭的。因此，我們也應假定，俄共第廿三次大會後，布里茲涅夫對日益趨向惡化的匪俄關係，更將作有利於俄國需要的謀略運用。

共產與自由敵對是世紀的特徵。在這兩種勢力敵對的世界上，由於核子武器的發展，自由經濟自身進步與改良，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破產，二次大戰後廿年間國際關係的實際演變，已經使初期美蘇兩極對峙爭衡的形勢，面貌漫漶。俄共第二十三次大會前後，檢討世局，確認國際局勢緊張，縱然可用以確保美蘇衝突而不決裂的彈性幅度是很大的，但是其可能控制的條件

却日趨複雜化。然而，鑒於美國答覆挑戰所採取的是「圍堵而不孤立」的原則，那麼，蘇俄就仍然可以用「衝突而不決裂」——搞世界革命而避免觸發全面核戰」的策略維持和擴張共產帝國的霸權。自黑魯曉夫垮台以後，布里茲涅夫等上台，經過一九六四年十月和十一月，一九六五年三月和九月四次俄共中央全會，以及若干次國際共產黨間的多邊會談。俄共對外政策設計人，肯定：

一、「當前時代是人類有史以來變化最大的時代；歷史發展的客觀法則，是沒有革命的形勢，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的革命。列寧認為革命形勢的一個最重要的徵候，是被壓迫階級的需要與貧困超乎尋常的迫切」；

二、「在當代的條件下，造成革命形勢的政治因素，是爭取滲透民主改造，勞動者權利的伸張，和平與裁軍，民族自決」，都可以為國際共產勢力「利用矛盾，從一個陣地到又一個陣地，展開鬥爭」。惟引據了陶里亞蒂的警句，認為新時代的共產運動必要「賦予民主以新的涵意」。——俄共這一野心是早就有的，做法上却在作新的選擇與試驗。

三、「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各國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各項根本改變，就其內容而言，便是革命性的改造社會與爭取民主的構成因素，也便是逐步以和平途徑走向社會主義——換言之也就是革命的一種形式」；

四、俄共新政權為有效執行一九六一年第廿二次大會新黨綱所決定的總路線，分析了自已手裏所掌握的力量，各國共產所累積的經驗，為減少阻力，認真檢討已經做了的是什麼，可能地合理地應當做的是什麼？確認第二十三次大會必策定：(甲)國民經濟領導的科學管理原則及新的五年計劃，(乙)俄共組織中央核心領導機構的改組與加強，(丙)適應國際新形勢，重申蘇俄對外政策總路線的口號是「為和平、民族自由、民主、和社會主義而鬥爭」。從黨的對外政治活動與政府的外交行政兩個範疇展開積極鬥爭。第一、確保在蘇聯進行共產主義改造與建設的和平條件；第二、循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國際主義雙重準則的辯證運用，增進共產集團內部的合作；第三、把握新的條件，助長工業發達國家的階級鬥爭；第四、推行「和平共處」的外交，避免美蘇間全面核戰；第五、支援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獨立運動；但確認「和平共處」的原則，並不適用於壓迫與反壓迫間的鬥爭，——以美國為首要敵人，從美國的側背與後方打擊美國。

四

分析當前國際局勢，俄共認定：(甲)一年來國際反共勢力的抬頭，主要因素之一，是由於共產運動內部的分歧；(乙)視美國全球戰略的發展與運用，為「新版的馬基維里主義」，並以勞倫斯上校，坎納黎斯上將的故事，是今天美國發動反蘇「外圍攻勢」的基本模式。(丙)美英兩國「蘇彝士海東」的共同協防，兩國「一面控制印度洋串珠基地，面對蘇俄的下腹中亞細亞，東扼亞洲的咽喉，西抑非洲的側背」，一面在「世界人口最多的空間散佈火種，在海上與風作浪——所製造的緊張局勢，萬分危險」。越南乃今天國際矛盾與衝突的焦點。(丁)遠東太平洋上的形勢因「日韓軍事秘謀」，及台灣戰略地位的增加與提高，出現新的變化；「歐洲主義」的復活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變質。「英國利用美國的實力，想挽回不列顛帝國沒落的頹勢，希望在全球各地恢復其影響力」；「德國唯有望獲得核武器來實現復仇主義的幻夢」。(戊)因而莫斯科迫切希望與亞洲的日本、歐洲的法國「改善關係」，制衡美國的地位。(己)蘇俄的理想戰略，是迫使美在冷戰中枯萎。最後，借美國內部左傾份子的手，埋葬美國的自由；否則就等到盤踞中國大陸的共匪一旦手裏也製造出足夠核武器，和美國對拼。俄共上項構想，基於各種理由，其中一點，是它深信美國左傾知識份子的迷惘和部份青年頹廢與墮落，以及毛共「接班人」仇美思想的加深，對於蘇俄都是有利的。(庚)今天全世界有理智和正確推理能力的人公認，如果不適時從毛共手裏救出中國大陸，核戰危機所形成的恐怖陰影便會越來越大。毛共之所以痛罵「蘇俄與各色帝國主義勾結，策動反華大合唱，圍攻中國」云云，也正是深知它中共是今天世界共產集團中，最脆弱的一環。美俄「和平共處」縱然對他們雙方而言，都是自欺欺人之談，但却是兩大核子巨霸，長期僵持敵對，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因此，美蘇一方或雙方之想謀取妥協辦法，平行抵制毛澤東發展核武器的野心，自屬情理中事。中共今天內部一團糟，不敢拉開大門，在天下人共賞它那毛澤東主義的人間地獄，這是事實。然而他之竟敢以窮兵黷武的獐獍面目，與全世界為敵，大搞民兵，同時又大搞煉錫造彈的把戲，正是繼人民公社大失敗，自速其亡。蘇俄不忘蠶食中國，今天却背不起毛共那個既爛又毒並且危險的包袱！以故匪俄關係無法澈底改觀。

五

改善人民生活水準，與大力從事軍備競賽，對蘇俄而言一向是無法兼顧的矛盾任務，不像在自由世界民主憲政國家，可以視選民的抉擇，由議會立法程序，遂行有效的調節與配合。國防計劃的實際執行，是俄共對外政策進向的重要指標之一。俄共第廿三次大會另有兩段插曲：

其一，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在四月一日對大會的談話中，於高聲咆哮，詆罵『美國在越南的戰爭使各國人民陷於法西斯黑暗時期』以後，透露『蘇俄的原子潛艇，已在水下完成了環球航行。近來蘇俄潛艇的遠程航行次數增加了四倍，航線說是北極到南極』。

其二，蘇俄的第一個人造月球衛星『月球十號』成功的發射到逼近月球的軌道上，向俄廿三次大會會場播回了來自太空的共產「國際歌」聲。——顯示它不僅要赤化地球，更要赤化月亮。

蘇俄人民聽到上述兩件消息以後，目瞪口呆，心裏納悶自問：『何以蘇維埃的農業生產計劃永遠是失敗的？』『有潛水艇可以完成環球航行，有人造月球衛星，可以從逼近月球軌道上播回共產國際歌；何以半個世紀以來，凡是實行馬列主義的地方，人民總是穿不好、吃不飽，沒有人格尊嚴、和人之所以為人的起碼的自由？』

以上談話，是專為提供今天座談會各位先生參考討論大綱所列子題進行研討的一段引言。在先，在四月一日日本所舉行週年紀念會時，在座的馮德元先生會針對俄共廿三次大會布里茲涅夫報告有關蘇俄對外政策部份，鈞文提要有一篇內容充實而語文精簡的報告。本人今天鑒於在各位手邊都有布氏報告的全文在手，以故在談話中引用背景資料較多，對布氏報告未作直接的分析。敬請原諒、指教。

呂 律先生：

蘇俄新五年計劃簡述

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重要任務之一，是完成俄共一九六六——一九七

〇年發展蘇俄國民經濟五年計劃指示的討論程序。

這個計劃在所謂列寧主義總路線、俄共綱領及俄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十月及其以後各次全會、尤其是一九六五年三月和九月兩次全會、關於蘇俄農業和工業改革所作的決定之基礎上，提出增強國防力量，促進經濟繁榮，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和促進蘇俄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競賽達到更高境界的目標。

在上述四個目標中，從新五年計劃指示草案上看來，俄共對增強國防力量要求非常強烈，因為這個草案不但指出「五年計劃應保證蘇俄國防威力進一步的增強，社會主義大家庭不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危險，鞏固愛好和平和解放力量的地位」；而且強調「在始終不渝的推行愛好和平的對外政策和力求實現裁軍的同時，必須對我國武裝力量擁有最現代化的軍事技術表現經常的關懷，蘇俄國防力量的增強，是維護和平和各國人民安全的必要條件。」

為了達成上述的目標，俄共認為新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是在全力利用科學技術成就、全部社會生產的工業發展及提高效率 and 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保證工業有大的高漲，農業有高度穩定的發展速度，從而導致人民生活水準實質上的提高，更充分的滿足全體蘇俄人民對於物質和文化的需要。更詳細一點說，就如波里揚斯基在去年十一月六日十月革命四十八週年紀念會上所作的報告：「在今後的五年計劃裏，將以特別的注意來發展動力工業、冶金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業和儀器製造業這些主要部門，國家打算繼續執行在七年計劃中所明確規定的路線，也就是優先發展決定工業整個技術部門的工業；同時，今後幾年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加速發展日用品的部門。在農業方面所擬定的行動計劃，決定要採取很廣泛的根本措施，消除我國農業在其發展中的落後情況。」

蘇俄的新五年計劃，與過去相比，很明顯的有兩大特點，這就是把一向盲目提高工業成長率降低下來，同時修改了經濟中的比例關係。新五年計劃規定，五年內，將工業的產值增加四七——五〇%，其中生產資料的生產增加四九——五二%，而消費資料的生產增加四三——四六%；此外，特別申明保證加速發展消費品的生產，並且使農業的發展速度接近工業的發展速度，使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速度與消費資料生產的發展速度接近的方針。這是前所未見的一些重要改革。

蘇俄這個新五年計劃，雖然與以往的幾個五年計劃和七年計劃比起來，是相當低調的一個五年計劃，不過到一九七〇年要達到計劃上所列的總目標和一些個別的指標，也並不是無條件的。

前面我們說過，這個計劃主要以去年三月的農業改革和九月的經濟改革為基礎，所以預期其成功，就必須首先做到五個「結合」的工作，這就是：

——機動的將經濟上「有根據的」中央任務同地方上的主動性結合起來；

——在全面發展各加盟共和國的經濟、在配置生產時，要將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同各共和國的利益結合起來；

——在不斷實現關於完善計劃工作、生產經濟刺激、擴大企業自動性和經營自主性、提高勞動者工作成果物質鼓勵的基礎上，改進經濟領導，要保證中央的計劃領導與發展各工業企業主動性和經營自主性正確結合起來；

——保證中央的農業計劃領導同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經營的主動性和自主性的發展正確結合起來；

——保證更澈底的將每一個工作人員的利益同企業集體和整個社會的利益結合起來。

除此之外，就新五年計劃草案看來，俄共爲了促成計劃的成功，會就積極與消極的方面分別提出呼籲。

積極方面，俄共中央要求：領導幹部要具有經濟領導的方法，運用管理方面的最新科學，採取現代的計算技術，力求減少管理機關；一切集體和每一個工作人員，要加強責任心和發揮自主性；教育每一個工作人員對勞動具有共產主義的關係，對待人民的財產具有經濟的意念，鞏固生產紀律和國家紀律。

消極方面要求：要毅然決然的同任何驕傲自大、自安自慰、漠不關心的表現鬥爭；對於本位主義和地方主義的限制表示不能忍受；勇敢的發展缺點的批評；毫不留情的剷除官僚主義；推行反形式主義的鬥爭。

但是，我們知道，積極方面的條件也好，消極方面的條件也好，其形成與消滅，都不是簡單僅憑呼籲可以做得到的。並且我們敢肯定的說，計劃草案在結尾中說：「順利完成五年計劃，是同進一步提高黨務機關的作用和勞動人民思想——政治教育，是同共產黨人提高和完善開展羣衆創造積極性的組織工作，有其最密切的關係」，這正暴露出俄共黔驢技窮的一籌莫展之態。

，死抱着將近半個世紀的八股作風，而無視於它所處的當前時代與環境。波里揚斯基在十月革命四十八週年紀念會上的報告中說：「工業的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要決定於實現俄共中央兩次全會所規定的改革。」這兩句話不但是針見血之論，而且是等於告訴我們，不能實現這兩次全會所決定的改革的話，就是事業的失敗，因爲這兩次全會的決定，並不是根據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本位主義和地方主義而制定的。

最後，我要爲諸位先生另提一項資料，就是說蘇俄這個新五年計劃早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已着手擬定，大約到十月革命四十八週年紀念時已大致完成，而且現在這個計劃大體與前俄共第一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黑魯曉夫的構想幾乎沒有什麼出入。

黑魯曉夫在一九六四年十月的一次俄共中央與蘇俄部長會議聯席會議上對於「制定最近期間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方向」，曾提出下列指示：

「因爲七年計劃要在一九六五年完成，所以最近期間必須以俄共綱領中提出的關於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的任務爲着眼點，制定順序的發展國民經濟的遠景計劃。

「在擬定最近期間的遠景計劃時，必須遵循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爲這個計劃的主要任務。假如說我國頭幾個五年計劃及其以後的年份我們曾把主要的支撐點放在提高全國經濟的基礎上——發展重工業、加強國防力量，則我們現在在具有強大的工業、處在一個應有的水準上的國防的時候，黨就要提出更迅速的發展生產消費品各部門的任務。」

黑魯進一步的說：「我們以擴大社會再生產的生產資料生產業已達到，並且今後也能高速度發展爲依據，應在制定計劃時，規定加速發展消費品生產及人民福利進一步的提高，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應當把握住使國防永遠處於一個應有的水準上，因爲反對我們蘇維埃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大家庭各國的帝國主義冒險者依然存在。」他不厭其詳的又說：「在制定發展國民經濟遠景計劃時，我們必須記住，它的順利完成，祇有在和平的條件下才能加以保證。我國人民，全世界的勞動者，他們都贊成和平，反對發動核子大戰。因此，進一步提高國家的國防力量，以鞏固世界和平，這是我們一向所重視的。」

從上述黑魯「關於制定最近期間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方向」的指示中，

我們不但知道蘇俄新五年計劃的草案從一九六四年十月就開始擬定，而且使我們知道今天以布里茲涅夫和柯錫金為首的俄共政權，對於發展國民經濟所提出的目標與黑鷹當初的構想毫無二致，這是因為他們奉行同一個列寧主義總路線和同一個俄共新綱領之故。

夏忠茂先生：

新政權的政策相當平實穩定

各位先生：剛才聽到三位先生的報告，不但詳細，而且看法也非常正確。本人對這個問題，沒有多大研究，主席要我發言，我祇得把一些臨時想到的感想說出來，請各位指教！

第一，關於共黨組織問題。剛才已有很詳細的說明。我覺得，這次俄共大會決定將第一書記改名為總書記，將主席團改名為政治局。雖說是名稱的改變，但顯然別有用途的。我們知道過去的俄共政治局改名為主席團時，正是史達林死前一年，就是一九五二年。那時政治局的委員和候補委員人數比現在還少，大概不到十五個人。當時史達林為了要分散政治局委員的權力，改名為主席團，將委員和候補委員增加到卅六人。也就是說比原來人數增加一倍多。當時，他削弱原來政治局委員權力的動機，可能是為了培植馬林可夫做他的承繼人，削弱政治局老委員的權力，同時吸收一批新人來幫助馬林可夫，這是史達林個人的一種作法。史達林死後主席團委員人數又變成十幾個人了，其間雖經過了黑魯曉夫的反史達林運動，主席團經過了好幾次改組，人數並沒有什麼大變動。這次恢復政治局的舊名，使它名符其實。剛才關先生也提到，政治局是十月革命以前的產物，是列寧時代的俄共機構，所以並不能看作是恢復史達林主義的訊號。不過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其次，把第一書記改成總書記的意義，根據個人的看法，似乎布里茲涅夫的權力比過去鞏固了。因為第一書記是叢書記中的第一位，沒有統攝的意思，而總書記是許多書記裏面的一個頭子。當然布里茲涅夫地位的鞏固，並不是說他已恢復史達林所擁有的權力。

總之，上列改名有結束黑魯曉夫時代的意義。因為一般認為，新的政權仍舊繼續執行黑魯曉夫的路線。沒有新的感覺。新政權要和黑魯曉夫時代完

全切斷，使人們感覺到這個新的政權在開始新的時代。

就此次政治局的人事來說，包括有許多俄共中央書記和各加盟共和國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和第一副主席，跟過去沒有什麼不同；唯一令人注目的是貝爾謝的進入政治局，貝爾謝是拉脫維亞第一書記，拉脫維亞是蘇俄一個很小的加盟共和國，他雖然資格很老，但比起米高揚、謝維尼克等老布爾雪維克還差得多；雖然他也是一個老布爾雪維克，可是他在當時祇是一個拉脫維亞的地下共黨頭子，跟米、謝等人比起來，地位差得多了。而這次，他為什麼一躍而起呢？據我個人猜想，正確與否還請各位指教，第一、他現年六十七歲，是個老布爾雪維克，米高揚和謝維尼克既已退休，起用他表示老布爾雪維克尚未在克里姆林宮絕跡；第二、波羅的海三國地位重要，這些國家都是二次大戰前夕被蘇俄所併吞的。反共情緒很高，在政治局裏從沒有一席之地。這次貝爾謝進入政治局，沒有經過候補委員歷程，就一直升到政治局委員。這在俄共人事中是很少有的，所以貝爾謝的提升顯然有其作用。

就書記局人事來說：現在書記局有十幾個書記，其中布里茲涅夫、蘇斯洛夫、謝列平、基里林柯四人兼任政治局委員，可見他們在書記局的地位較高。除了布里茲涅夫是總書記外，其餘三個，以蘇斯洛夫、謝列平較有力量。在發表名單之前，一般外國報紙都認為，謝列平很可能取代布里茲涅夫地位，尤其當他被免除黨政監察委員會主席而專任書記時，一般認為他是僅次於布的第二書記，但從發表名單的次序上看，蘇斯洛夫排在謝列平之前，根據過去蘇俄慣例，名次排列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次政治上發生變動，名次排列馬上就會不同。所以，我個人推想今天的蘇斯洛夫的地位要比謝列平高。由此看來，謝列平被免除黨政監察委員會首長之職，是因為該會權力過大，有威脅集體領導的可能。從這次大會所發表名單次序來看，謝列平的力量被削弱了。現在在黨裏面最有力量的是布里茲涅夫、蘇斯洛夫和謝列平。當然，所謂集體領導還得加上柯錫金和包戈尼。照蘇俄歷史來看，黨是抓著實權的，而柯錫金雖然地位很高，無論如何是抓不到權的，他不過是領導人之一。可是，他可以平衡權力。根據蘇俄歷史來看，部長會議主席，是行政上最高首腦，是無法接近權力的。黨中央書記才能接近權力。所以蘇俄集體領導是由布里茲涅夫、蘇斯洛夫和謝列平為權力的核心，對外而言，當然還加上柯錫金和包戈尼。

第二、關於新五年計劃問題。談到新五年計劃，可以說，也有一新耳目的感覺。過去五年計劃都是以工業爲先，尤其是重工業；而這次五年計劃是以農業爲主，這是一個最大的不同，是過去幾次五年計劃所沒有的。從五年計劃草案來看，工業發展是以冶金工業、電力工業、機器工業和化學工業爲主。當然，冶金和動力是發展工業的基本部門，沒有這些部門就談不上發展工業；而機器工業特別強調農業機器。化學工業則以生產肥料、日用品爲先。至於輕工業與食品工業的發展，與農業生產有着密切關係。將農業擺在一邊，輕工業與食品工業就無從辦起，可見這次五年計劃的工業是以支援農業爲主的。

這次五年計劃因何把農業作爲主要任務提出呢？當然有其原因的。第一，是因爲要提高國民生活水準。既然要提高生活水準，如不把農業放在第一位，就無從談起。同時我們也知道，在過去，蘇俄一直沒有注意農業，只顧到工業；重工業發展是犧牲農業而來，因此農業非常落後。我們常常從報紙上見到，蘇俄時常鬧饑荒，時常向外國買糧食。跟美國比較起來，美國十個農民可以養活一百人，也就是百分之十的人口，養活了百分之九十的人口。而蘇聯則是百分之四十八人口，養活百分之五十二人口；也就是一半人口養活另一半人口。因此第二，這次五年計劃着重農業，也在阻塞外匯的漏洞。這次五年計劃，就外表看，看不出新穎之處，因爲黑魯曉夫的新綱領裏，已經有了自一九六一至一九八〇年的廿年經濟建設計劃，而這個五年計劃祇是廿年計劃的前十年中的後五年，也就是新綱領裏廿年計劃內的第二個五年計劃。

第三、外交政策方面。外交政策是根據國內的政治而決定的。至於蘇俄當前的政治目標，我們可從五年計劃中看到，是要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完成廿年的經濟計劃；因此，在外交上，它是不希望有戰爭的。如有戰爭，不但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更無法克服農業上的落後。它的外交原則，我套用一句共匪的術語「三和兩全」的三和兩個字來概括；所謂三和：就是和平共存、和平競賽、和平過渡，這三和就是蘇俄外交政策所遵循的基本原則。

因此蘇俄當前外交政策：第一避免戰爭。第二爲了維持其共產集團的盟主地位，也不能放棄或不管國外的革命運動。更不能放棄在落後地區即：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區——發展它的勢力。在這些地區，發展當然會和

中共匪幫的力量發生抵觸，因此圍堵中共，孤立中共是不能避免的。對歐美方面，是拉攏法國和日本，以孤立美國。

最後，我認爲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是表示黑魯曉夫時代的結束和布里茲涅夫和柯錫金新時代的開始。此次大會，無論對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都有新的發展；新政權的政策是相當平實穩定，不似黑魯曉夫帶有那種浪漫主義色彩和粗獷作風。此次大會所通過的政策反映出是在革新派和保守派、自由派和死硬派的爭戰和妥協下達成的結果。

何浩若先生：

謝列平現在權力仍然不小

各位先生：我很抱歉，因下午我有兩節課，趕來後已無法聽到各位先生的高論，深感遺憾。我個人內心裏對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各位同仁的研究精神，可以說是由衷的欽佩。並且對吳所長的努力成就，也非常佩服，所以我很願意參加這個座談會多有些經驗；今天既未能聽到各位的高論，自己對這個問題又沒有深刻的研究，因此覺得特別是對蘇俄問題有許多地方不易瞭解。譬如說：我見到英文報紙報導蘇俄的十一個政治局局員中，有一個基里林科，我就無法決定是不是基里林科的錯誤，還是另外一個人。拿外國報紙來說，我們見到的英文報紙的報導，也很少有價值的材料。

台北中央社的記者由倫敦發回一件專電，報導倫敦保衛報一位專家撰的一篇專稿，我看了幾遍終於看不懂，各位想想中央社從倫敦拍一個專電，當然需要很多錢，而且這個報導也定很重要的，但是這個報導說：蘇俄要組織一個四人執政團，且指明是由布里茲涅夫、柯錫金、包戈尼和蘇斯洛夫四人參加，我覺得這是不不可思議的，因爲我們中國人特別瞭解俄國的政治制度，我們一向知道中央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即是政治局，那麼在十一個人的政治局裏，怎麼又會產生一個四人執政團呢？這位撰稿的英國專家是如何研究出來的，而且又是經過中央社所報導，所以應該是不必令人置疑的，但是我繼續看下去之後才發覺這個人十足的是一位外行，因爲他講謝列平是走下坡路，失去了監察委員會的位置。根據莫斯科的報導書記處的職位沒有變動，謝列平仍然是組織部長，組織部長的權力，比監察委員會的大多了，謝列平失去

監察委員會的位置還是去年的事。

包戈尼是黑魯曉夫爲了要抵制布里茲涅夫，才把他調進來的，包戈尼與布里茲涅夫都是烏克蘭人，假若黑魯曉夫不垮台，布里茲涅夫是要被壓下去的，當時包戈尼是組織部長，權力很大。那麼謝列平仍然是組織部長的話，現在權力仍然不小。

政治局十一個人的名次是布里茲涅夫列第一，柯錫金第二，包戈尼第三，蘇斯洛夫第四，沃洛諾夫第五，謝列平第六，謝列平的名次爲什麼這樣低呢？我以爲名次是拿票數多決定的，謝列平祇有四十七歲，在黨內的資望還淺，中央委員選他當政治局員的票數還不算太多。

蘇斯洛夫是一個理論家，英美的專家素來捧他，以爲他會取得蘇聯的政權。現在看見他當選了第四名的政治局員，便把他提進四人執政團去。但是那裏會有什麼四人執政團呢？這是很難瞭解的。

嚴靈峰先生：

俄「和平共存」政策目的在拖垮美國

現在美國和海外很多學人研究匪俄問題的方法，不少從事於對當權人物的個人研究工作。當然這種研究是很需要，不過有時可能發生錯誤。譬如說對某人，很久未見露面，便以爲他已經失勢；其實共產黨神出鬼沒，他的行蹤是詭秘的，可能將他派去主持核子武器實驗，研究發展，也許是真正重病猝發。又如：在公共場所某人的相片位置變更，或者被取下來，就斷定某人業已垮台；這可能是正確的，不過這些都是事後既成的事實，並非預測。研究的關鍵在乎判斷於機先，以後事實發展證明其推斷的正確；却不是要作「事後的預言家」。比方這次我們召開國民大會，主席團的選舉，不見得票數多的地位就重要；有的平時沒有什麼作用的人竟然當選；不少很有地位的人士，因感票數不足，臨時放棄競選，這就不能將個人的地位和作用的比重由票數來決定。雖然這都是研究問題的必需資料，但是却不能作爲絕對依據。

就當前蘇共組織問題，因爲時間有限，所以我僅就討論題綱內的第一項第一目：「俄共中央主席團改爲政治局之意義」，發表一點意見：第一、在黑魯曉夫時代曾經高唱所謂「集體領導」，他們現在又恢復「政治局」，乃

是回到史達林時代，甚至是列寧時代政治局的組織；也就是再由「集體領導」又走向以前的舊路。第二、是將第一書記改爲總書記，這也是開倒車，要恢復舊的體制。第三、撤銷俄共中央俄羅斯聯邦局的措施，乃是削減地方的勢力，採強本弱枝的辦法，又將權力集中到蘇共中央。

以上這三點的新措置，完全是由「集體領導」再回頭向「個人獨裁」方向走；但是，今天蘇共要想返回到列寧、史達林時代的個人領導，事實上恐怕不大可能。因爲，這必須經過黨內猛烈的互相殘殺和流血鬥爭。所以目前最多祇能做到少數巨頭（可能是布里茲涅夫、柯錫金、蘇斯洛夫、謝列平等人的合作）控制整個「政治局」的「寡頭政治」的局面。

其次，對蘇共何以要恢復全蘇黨代表大會之意義，我認爲這一次政治局內的幾個人之中，可以說包含有三個世代的人物在內，其中最老的一位是貝爾謝，已年屆六十七歲，算是老布爾雪維克的第一代的人物；而第二代的是布里茲涅夫、柯錫金、蘇斯洛夫等人；所謂第三代即是謝列平，他是由青年團出身；其他大部份都是後起之秀。像謝列平乃是在蘇俄革命以後才出世的。所以，就當前的情勢來看，在蘇共黨員的成份中，雖「三代同堂」，其實正處於新陳代謝的局面。特別是近五十年來，蘇俄國內的社會上，人事的變動甚大。老的一輩除被史達林殺的殺光之外，主要的幹部殆已淘汰；第二代的一輩也慢慢的被打倒了，如馬林可夫之流。正因爲其社會基礎已經變更，所以政治局是代表了第二代與第三代人物的合作，大概也是由於該黨的下層黨部中新人物的逐漸抬頭的緣故。

爲什麼俄共要準備召集全蘇黨的代表大會（按：過去每四年召開一次）呢？原因是希望政治局這一批巨頭能夠得到全蘇黨代表大會的支持，使他們的權力更廣泛地得到合法的承認，以謀鞏固他們新的領導地位。我想他們的企圖和主要原因即在於此。

過去黑魯曉夫的「集體領導」，也並沒有解決許多重要問題。因此，他們今天又想逐漸的走向少數人的小集團來控制當前局面。因爲蘇俄今天的經濟基礎已在漸漸的向資本主義讓步，俄國人是以前經濟爲基礎來決定政治動向的。例如，現在所採取的獎勵制度，利潤政策，並有限度地允許自由市場存在，無一不是朝向過去資本主義經濟的後退。所以他要想將政權恢復到列寧、史達林時代的個人獨裁的政治條件是很難的。

關於蘇俄現階段的外交政策問題，我們首先要看他的本身內部問題。這主要是匪俄衝突問題，今天我們還看到報紙上報導，紐西蘭還想和共匪一起召開一次會議，以與蘇共對抗。另外，像北韓、北越、外蒙古、古巴等過去對毛共都很密切，現在也逐漸向蘇共接近靠攏，就一般情勢來看，現在毛匪澤東的地位及毛共在共產集團中益見孤立。但是，如果根據這次布里茲涅夫所講的話：「我們也準備好任何時刻同中共領導一道，重新討論現有分歧，以在馬列主義原則上，找到克服分歧的途徑」，仍然要求「妥協」，並不像黑魯曉夫時代那樣露骨地來逼迫他們，而是想到了時機成熟的時候再開一次國際會議，能夠說服毛共，使他們就範；而不願意將匪俄之間的破裂的責任擺在自己的身上。另一方面，這並不妨礙俄共「笑裏藏刀」在中國大陸派遣特務拉攏反毛份子從事顛覆活動，企圖控制整個大陸。

但是，共產集團的分裂，在整個世界情勢來說，對他們都是不利的。所以，我們從他們的談話中，就可以看出，在目前是不會採取很劇烈的辦法，與毛澤東走向決裂；除非毛澤東要聯合紐西蘭等共產黨開會另起爐灶，激烈的鬥爭下去。蘇俄之所以不願背上這個分裂的責任，因為一旦由俄方與共匪分裂，有失「老大哥」的風度；他們就無法領導和號召歐洲的附庸國家。

至於「和平共存」的政策，以前有很多人持如下的想法，認為「和平共存」就是「修正主義」；但是，我一向不持這種看法。更有人指黑魯曉夫自己都承認和實行「修正主義」。照我個人所研究的瞭解，「修正主義」是共產黨傳統的罵人的口頭禪；世界上決不會有人被人罵為「渾蛋」，自己却承認是個「渾蛋」的道理。其實自列寧開始以至於史達林，對於馬克斯主義老早就加以「修正」過，可是他們却開口閉口都是自稱為「真正的馬克斯主義者」；誰肯承認自己是「修正主義」呢？毛澤東自己主張利用農村打城市，「土法煉鋼」，乃至「人民公社」，那一點是馬克斯主義呢？而他自己却天天在罵「修正主義」。

蘇共是否承認像美國這樣資本主義國家會「和平轉變」到共產主義呢？不會的。他們所說的「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是指新老殖民的解放運動的勝利。布里茲涅夫明顯地說：「這些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更加澈底的暴露了。結果，國際緊張加劇了，帝國主義者首先是美國的侵略行動，引起戰爭危險增加了」。這又如何能使美國「和平轉變」？

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分析

實際上，蘇共提出「和平共存」與「和平競賽」的口號無寧是一種世界性的「政治戰略」，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與各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召集「反侵略和平會議」如出一轍。在他們看來，現在資本主義世界危機尚未成熟；同時，今天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上沒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在美國；所以還繼續高唱這種濫調；祇要美國內部一旦發生危機，便要設法加以打倒；那整個的世界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了。布里茲涅夫還指出：「資本主義體系正在經受着總危機」。誰個會和陷入總危機的國家「和平共存」與「和平競賽」？希望同快要死亡的敵人「和平轉變」？再則，現在許多落後國家像非洲、南美洲的各小國家及東南亞各國都有問題，而越南問題便是一例。蘇俄有一次在公報中公開承認：「會以武器供給北越」，像現在北越所用的飛彈、米格二十一型戰鬥機，絕非毛共所能供應的；蘇俄為何要在這樣遠的距離，把有力武器送到越南，主要的目的無疑地要把美國拖下去。

所以，美國人今天還在幻想，做着「和平的美夢」。蘇俄僅僅用這一點小本錢，就把美國給拖在越南，使美國勞師遠征，派出三十萬的部隊，和支出龐大的軍費。在國內，掀起不安的局面；這就是上了俄國人「和平共存」的大當了。這等於在我們抗戰時拖住日本人，使他們陷入泥沼是一樣的。所以俄共的這個和平攻勢政策是十分可怕的。拖到美國在越南進退維谷，而使美國在越南的立場非常尷尬，猶如啞子吃了黃連，有苦難說。我要重複地說，蘇俄的所謂「和平共存」政策，決不是希望美國能「和平轉變」，而是希望將美國一直拖到筋疲力盡，內部發生了問題，拖垮為止；使他會自己來個「革命的轉變」；絕對不是希望蘇聯總統及其同僚會自動而「和平地」走向「社會主義」。我想美國明智的政治家一定有此警覺的！

周之鳴先生：

對俄國民經濟計劃的幾點意見

(一)最近鄧竹園博士對於蘇俄國民經濟計劃工業部門的失敗，認為「各工廠企業聽命于莫斯科的中央工業主管部，沒有地區性的聯系機構，儘管許多工廠設于邊疆，但沒有莫斯科的命令，地方政府無權協調」，是其主要因

素之一。實則不然。第一、以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來說，不僅有地方的計劃委員會，而且並派有代表各駐各地，研究地域間的重要問題。再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下級機關，除地域計劃機關如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省、州、邊區、城市及區等計劃委員會外，又設置有分類計劃機關，設在工業、農業及交通等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每一生產、經濟及管理機關之內。例如中央各工業部，加盟及自治共和國的工業部，省、州、邊區、城市及區的各工業管理機關，以及總管理局，托拉斯，工廠，車間及生產小組等各處，均設置有計劃機關。地域計劃及分類計劃的計劃工作過程，分縱橫兩方面進行，當然在這過程中，兩者之間是互相關聯的。例如：某地某工廠的計劃，在它所從事某一生產部門事業的關係上來說，是縱的系統中之一個單位，但同時它却又被包括在它所在地方的地域計劃之中。因之，地域計劃機關和該企業的上級分類計劃機關，在計劃工作上的關係就分不開，而雙方也就必有所協調。第二、以莫斯科中央與加盟共和國在經濟計劃方面權力的劃分來說，早在一九五五年，莫斯科對加盟共和國的和主管部門，就只集中規定總產值和商品產值任務，基本建設工作總量、工作人員限額和工資基金，而加盟共和國則有權為共和國的和主管部門規決各種工業品生產的計劃任務，有權規定一切項目的基本建設工程項目的批准程序，而不受工程的預算價值的限制。第三、以一九五七年成立的國民經濟委員會來說，不僅有加盟共和國國民經濟委員會，也更更有地區國民經濟委員會，而且這種地方國民經濟委員會早在列寧時期就有了。第四、以企業的權力來說，早在一九五五年，在計劃工作、建設工作、物資利用、生產撥款方面，以及在人員調配問題和工資問題方面大大擴大了企業的權限。企業的技術生產財務計劃，固須根據上級批准的分季年度計劃，並按全部數量指標和質量指標而制定，但也有許多獨立權限，如訂貨者同意提前交貨時改變交貨日期，企業也可在季度內將設備生產計劃做必要的修改，可以規定產品的價格和勞務費，可以適當改變零件的成批生產，單個生產或試驗生產的技術操作過程。此外，廠長可以根據年度計劃批准月份的基本建設計劃和新能力的動用計劃，批准限額以下工程項目表，批准初步設計和一定預算造價的工程項目的財務概算，可以在國家勞動計劃和職員、工程技術人員計劃範圍內規定車間和廠部各科室的人員構成和人數，還可以獨立決定同採用新技術操作法有關的許多問題。尤其注意

的是，他還可運用企業基金，採用新技術，更新現有設備，擴大生產，建設和修理企業住宅，改善對企業工作人員的文化生活服務。這說明上述鄭博士的意見還有可以討論的地方。另外，更有一個為一般所忽視的事實，即蘇俄在經濟各方面，是規定採取自下而上的即從各個企業和集體農莊開始的計劃工作原則，以工業來說，即根據企業預先編好的計劃制定經濟部門的國家計劃的。所以，蘇俄經濟的失敗，並不在於實行極端中央集中制，不在乎沒有地區性的聯系機構，以及工廠與地方政府的更沒有權力。因為中央控制權力早已部分下放地方政府與工廠了。它的失敗是另有原因。就計劃與計劃機構來說，它的原因在本位主義、地方主義尤其是官僚主義。

(二) 鄭博士以為蘇俄的高等計劃經濟的失敗，基本癥結之一，是「俄式制度沒有利潤作為後盾」。但早在列寧時期，他就已經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以後實行利潤制度，實行經濟核算，講求盈利了。問題不在沒有利潤，而在講求利潤，並不與創造利潤的勞動者。後來，雖經改革勞動者也得分享利潤，但也少得可憐，起不了大的鼓勵、刺激作用。

(三) 蘇俄的試行西方市場法則，也不是開始于李柏曼教授，早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廿五日，列寧就把一大部分食品實行自由買賣了。再如計件工資及泰羅制等資本主義方法的採用更早，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廿九日，列寧就實行了。

(四) 列寧死後史達林仍然繼續奉行列寧的資本主義的改革路線，有的且比列寧更徹底，黑魯曉夫與今新領導者也都如此。然毛匪却對布里茲涅夫、柯錫金的經濟改革措施大肆攻擊，說它違反列寧主義。其實，反叛列寧主義的，不是布、柯他們而是毛匪自己！

(五) 蘇俄的經濟，既從列寧開始，經過史達林、黑魯曉夫以迄今日的布里茲涅夫、柯錫金，都是一貫的採取資本主義制度或是實行資本主義的改革，那麼是否可說是資本主義的復辟呢？這問題說起來，又倒頗覺趣味。蓋列寧自己說過：消滅土地私有制，實行銀行與工業的國有，這都不是社會主義，只是一些導向社會主義的措施而已。又說：蘇維埃共和國，並不表明認為它的新的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的。換言之，如果以為土地、工業與銀行的國有，就是社會主義的特徵，那是錯誤的。列寧自己承認：他還不能闡述社會主義的特徵，還沒有材料用來說明社會主義的特徵，建設社會主義的磚頭

現在還沒有造好。如果今日蘇俄新領導所辯護的，以為生產資料控制在政府或國家手裏，這就是社會主義，這話是正確的話，那麼，蘇俄的農業生產資料如拖拉機等等又大部在集體農莊掌握之中，這又作何解釋？何況，現在蘇俄憲法，又復保障全國人民的個人財產與私有權，而事實上蘇俄人民也確個個都有私有的個人財產，說它是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又實在有點問題。列寧再三說他的經濟制度是國家資本主義或社會國家主義，這話很有道理，值得我們注意。由自由貿易產生資本主義，由資本主義又產生帝國主義，這是列寧經濟發展的規律，而今蘇俄正是個帝國主義，只是應該加上「赤色」二字而已。

(六) 至于新五年計劃，三月廿四日蘇聯計劃委員會副主席涅彼金斯基有一篇關於說明它的特點的談話，除了提高農業與日用品的生產，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是說：「草案的另一個特點，是優先發展中亞細亞、西伯利亞和遠東的經濟，正是在這些邊疆地區最近發現了很多豐富的礦產，並計劃特別加速建築大型企業，這是因為在經濟上是很有利的」。這表示蘇俄的經濟建設中心，已從歐洲移到亞洲地區。我們應加注意。

王作榮先生：

從統計數字看蘇俄經濟危機

根據國際關係研究所所提供的資料，蘇俄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五的七年計劃期間，國民所得增加了53%，簡單平均每年成長率為「1」%。資本形成率為90%，簡單平均為13%。工業成長為84%，簡單平均為12%。這是代表一國經濟活動的三個關鍵數字，假如這些數字不是捏造，則從任何觀點看，這都是代表一個高度成長高度繁榮的經濟，在這種經濟情況之下，必然有下列結果：(一) 高度就業，勞工縱然不嫌缺乏，必然也要接近充份就業，至少在工業部門應如此。(二) 生產量高，至少工業消費品應無嚴重缺乏之現象。(三) 人民購買力強，貨物銷售快。

但實際情形並不如此。第一，據蘇俄官方宣佈，工人工作時間減為每天七小時至六小時，這是在美國都做不到，以蘇俄的經濟發展階段，無論

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分析

如何其工人的生產力不會高到每天祇做七——六小時的工，而能維持相當的生活水準，何況現在還正是「大力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所以可以判斷這種減少工作時間，完全是由於無工可做，即無適當的資本配合勞工工作，也就是有嚴重的失業現象，這種失業與落後國家的隱藏失業完全一樣，都是在努力過多，資本過少的情形下，三個人或四個人做二個人的事。第二，據蘇俄官方歷次公開宣佈，工業消費品與農產品嚴重缺乏，特別是耐久性消費品如冰箱、汽車之類更缺乏。第三，發生大量退貨現象，許多工廠所生產之貨物大量堆積賣不出去。

根據以上兩種互相矛盾的現象，我們可以十分肯定的推斷蘇俄經濟現狀如下：(一) 有嚴重的失業現象，工人無所事事（無所事事的人最容易出亂子）。(二) 因為經濟成長率高，人民手中的購買力強，提高生活水準的欲望也就隨之加強，然而買不到那些可以提高生活水準的東西，包括高級農產品如肉類。反之，那些維持低生活水準的東西，以及品質低的東西，則大量生產，但不能滿足消費者的欲望，因而也就賣不出去，或退貨。這是生產政策與所得水準不配合。

如此，一方面有大量無所事事的人，另一方面這些人有大量用不出去的錢，而許多有能力滿足的欲望，實際上都不能滿足。這兩者結合起來，在現代的教育與知識傳播的方便之下，足可引起一場革命。根據這些推測，蘇俄內部人民不滿的情形一定很嚴重，黑魯曉夫的改變政策，及現政權的上台，去年新經濟政策的宣佈，和平共存的做法，恐怕都與此有密切關係。

那麼為什麼會造成這種矛盾現象的呢？大量發展太空科學與原子武器，是這種發展使得資本形成率高（需要龐大投資），工業成長率高，因而國民所得也高；是這種發展使得資本投入與產出率高，因而儘管大量投資而產出的實物甚少，且完全與消費物品無關，所以經濟儘管發展，而民生用品嚴重缺乏；也是這種發展使得資本投入與勞工就業比率高，即是儘管大量投資，而因為是高度技術的關係，所用勞力甚少，所以發生高度投資下的嚴重失業。

蘇俄當局解決這種危機的辦法，根據蘇俄官方的宣佈，有兩條主要路線：一是去年九月的新經濟政策，希望利用資本主義社會的辦法，在現有的生產結構之下，儘量增加生產，並儘量使產品適合消費者的需要，即是藉市場

價格機能，使生產政策與所得水準能够配合。一是最近宣佈的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的五年計劃，其內容爲國民所得增加率爲38%——41%，簡單平均每年成長率爲7.6%——8.2%，平均每人成長率爲30%，每年爲6%，資本形成增加率爲49%——52%，平均每年爲9.3%——10.4%，工業成長率爲47%——50%，平均每年爲9.4%——10%。以這裏的每年平均成長率與上次七年計劃比較，則資本形成率與工業成長率均較低，而國民所得增加率反較高；這即是表示蘇俄將放鬆太空與原子武器的競賽，而比較加重一般農業與農業的發展。這兩條路線，看似輕鬆，實際上則顯示了蘇俄當局的最大決心，前一路線等於放棄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後一路線等於放鬆共產社會的防衛與擴展目標，這不是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決不如此做。這也可以間接證明蘇俄國內人民不滿情緒之嚴重，蘇俄當政者以革命起家，當然深知這種不滿情緒的厲害，列寧可以革俄國皇室的命，現在的人民爲什麼不可以革共產皇室的命？因此，縱然犧牲共產主義的原則，放鬆太空及原子武器的競賽也在所不惜。

以蘇俄的經濟發展階段來說，它有能力的採取新的路線，特別是第二條路線，轉變起來，比較容易。但關鍵在於國際局勢，如果國際局勢緊張，情勢逼迫它非繼續大量發展太空科學與原子武器不可，則轉變難於成功，而國內不安情勢將日益嚴重，如果國際局勢緩和，則轉變便可成功。從這一點也可看出蘇俄自黑魯曉夫以來，在國際上製造緊張局勢的情形很少，表現和平共存的願望甚濃的基本原因所在。在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都可被迫改變的嚴重情形之下，和平共存算不了什麼。共匪罵蘇俄走修正主義的路，不敢強硬，理所當然。

以上僅是一個從事經濟研究的工作者，從幾個簡單統計數字所得到的啓示，實情是否如此，尙有待於研究蘇俄的專家們從另外的角度去探討和證實。

鄒宇光先生：

俄局變化富有繼續貶斥黑魯作用

主席，各位先生，方才聽到諸位的高見，覺得領教很多，茲就「俄共中

央主席團改爲政治局的意義」這一點，提出個人的補充意見。

大凡一個組織或機構名稱的改變，總有它的背景或原因，俄共這次將主席團改爲政治局，也一定有其意義，關於這一點，我想從俄共黨史的觀點，就這個機構的設立，以及性質演變這方面來剖析這次變革的意義。

俄共的政治局成立於一九一七年五月，一九五二年，即史魔死亡前一年更名為俄共中央主席團，迨至最近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中又更名為政治局，在其存在的五十年中，可說是俄共政權的領導中心，也是俄共內部權力鬥爭的場所，但政治局在俄共政權中所處的地位，卻因情勢和背景而不同，如由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列寧死亡時爲止，當時的政治局純粹是俄共中央委員會的一個附屬機構。其職權爲處理緊急的、不能延擱的重要案件，但須向中央全會報告，它的一切決定，交由國家機關執行，列寧晚年，雖然會強化政治局的權力，採取獨裁作風，但政治局的基本性質，並未發生變化。

史達林的一生可以說與政治局相始終。史魔係一九二二年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後被列寧提名爲俄共的總書記，但是在政治局中的地位，仍居少數。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寧死亡以後，俄共內部迭生內鬪，史魔運用權位，培植黨羽，安插私人，聯甲倒乙，爭取多數，煽動鬥爭，並將這些鬥爭，提到中央委員會場上，而設法擊敗對方。這是史魔運用中央委員會，貶抑政治局爭奪權力鞏固地位的一種作法。

經過一連串的血腥整肅殺戮，一九三九年史魔的獨裁政權，大致已告穩定，政治局亦爲其一手控制，成爲個人御用工具，也是統治俄共，統治全國人民，甚至於世界共黨的一個組織，相反的，俄共中央委員會以及蘇俄共產黨則已成爲政治局的附屬品。

一九五二年十月間俄共召開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根據黨章修正案，將政治局改爲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按當時政治局委員爲十二名，候補委員爲三名，改組爲主席團以後委員增加到二十五名，候補委員增加到十一名，即擴大爲二、四倍。史魔此一舉措的用意在於減抑政治局的地位，擴大成員，拔擢新人，藉以鞏固其個人統治。

自從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史魔死亡以後，迨至本年度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俄共中央主席團最少有十次以上的人事變動，其中每一次都有其權力派系鬥爭的背景，而其中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的黑魯曉夫之被貶謫

，更爲俄僑間權力鬥爭之一大事件。黑酋統治俄共，可從一九五七年六月之整肅反黨集團算起，至一九六四年止，時間共約七年，此其間功過得失，固難定論，但發展太空科學，對內自由化厲行反史運動，力主和平共存，匪俄交惡，農業失敗，附庸國控制動搖，均爲舉世著者，也就是由於這些緣故，俄共聲譽，無論在國內，附庸國家間，以及國際上都日見墜落。黑魔雖已罷黜將近兩年，此一情勢，亦未見有何改善，俄共當前領導情勢，個人獨裁，固不可能，集體領導，亦荏弱無能，黨的威信在俄人心目中，益趨低落，再加上最近宣佈的經濟體制改革，顯然是趨向一種開放的作法，如果黨在領導方面不能加強，也同樣採取後退的消極的措施，那共產主義的沒落，指日可待，所以俄僑當局寧可在經濟制度和政策上稍作有限度的修正，但是在政治上，黨的領導上則必須加以強化。所以將主席團改爲政治局，第一書記改稱爲總書記正如俄僑所供認：『……這個名稱，將更加充分的反映在蘇共中央全體會議閉幕期間領導黨的工作的我們的黨最高政治機關活動底性質。』

最後，我們可以這樣作一個比較，政治局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主席團則比較具有事務性或行政性質。如果說主席團是負責主持中央委員會閉幕期間的工作，那政治局則是比較長期性從事黨的政策策劃與指導。

下面三點，是個人對於這個課題的結論：

○俄局的變化，並不意味將回復史魔路線，但是却富有繼續貶斥黑酋的作用。

○上述一點看法，如果正確，自然是爲了俄共本身，但也可能是對共匪的一種手法。

○俄共政權是發在不穩定而力求穩定之中，將在提高俄共領導威望下繼續推行其既定政策。

丁慰慈先生：

俄外交路線最近將無大變

剛才孫委員報告中，謂第二十三次俄共大會，一般的印象是平淡無奇，也可以說是「平實」，而這種平實，正是布里茲涅夫等人按部就班的現實主

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分析

義作風。本人對此深具同感，并願就個人意見，加以詮釋：

就共產集團言之，北平和莫斯科的分裂，不僅打破了所謂革命陣營「牢不可破」的神話，而東歐集團向心力的渙散，尤表現莫斯科控制力的大非昔比。其中羅馬尼亞係公然在中俄共之間採中立路線，且在不斷擴大與西方國家在政治和經濟諸方面的聯繫。其他匈牙利、捷克等亦均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傾向。又如數月前蘇作家謝克斯基和丹尼爾兩作家被判徒刑案，引起西方國家共黨諸多不滿，且曾在大會中經法義兩國的共黨代表嚴厲指責，至于謠傳中恢復史達林地位問題，亦曾遭附庸國方面的反對。上述的指責和反對，在俄共史中可以說是很難找出先例的。

就蘇聯國內言之，史達林暴政，受害者不僅是蘇聯統治下的兩億臣民，當時即最高統治階層如黑魯曉夫等亦同樣戰戰兢兢而苟全于大獨裁者的屠刀下，黑魯曉夫繼承大統，本質上雖是換湯不換藥，但若不清算史達林，暫平民忿，實難以求一時的苟安。但老史被清算以後的俄國社會，自由主義的種子便不免遍地茁長新芽，而使俄共統治者難加防範。再則，大戰結束後二十餘年，俄共中央會申言要增加生產生活物質，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但一而再再而三發表諾言的結果，人民生活却迄未獲改善。尤其是較之戰後經濟蓬勃發展的日德等國，更瞠乎其後，蘇聯人民雖偏處在鐵幕中，亦并非完全不明瞭，可以說蘇聯人民無論在思想的自由，生活的充裕兩方面，均深深醞釀着不滿心理。俄共當局亦并非完全不了解。

就國際環境言之，美俄在太空方面的競賽，雙方難分軒輊，核武器的儲存，俄且遜美一籌，從古巴事件看，俄共統治階層確已懷然于核戰中玉石俱焚的可怖，越戰由發生到擴大，克里姆林深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此最初採取袖手旁觀的政策，後來禁不住中共一再諷刺謾罵，同時俄共也想在東南亞取得發言權，乃改採有控制性的插手政策。在此種政策之下，俄共當局自然逐步謹慎小心，藉免墜入被旁人看作「隔山觀虎鬥」的陷阱。

蘇聯的內外環境既如上所述，而克里姆林宮目前的掌權者，又都是辦公廳裏成長的人物，不是狂飈時代的產品，因此蘇聯第二十三屆大會之採平實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以下是平實政策容易看得見的幾點：

對中共諷罵，俄共在表面上採取逆來順受婉爲解釋的態度，以博取其他共黨國家的同情；但骨子裏却在處處爭取主動，藉求達到孤立中共的目的，

自亞非拉三洲會議以至於與外蒙訂約，到爭取北韓北越的成功，皆是莫斯科一貫的政策，二十三次大會中，由匈牙利、捷克發言譴責中共，無非是此一政策的運用，目前莫斯科在這一論爭上雖已取得優勢，但始終不願意把分裂共產國際的責任負在自己身上。

農業品不足，日用品不足，是蘇聯國內多年來的病態，也是多年來在五五年計劃中偏於發展重工業軍需工業的自然結果，史達林死後，俄當局開始明道出此缺點。但未有積極改善，俄共在此次大會中，一方面提高輕工業的生產數字，同時也增加了農業方面的投資，而對目前仍然普遍存在的缺乏現象，則率直批評是黑魯曉夫時代計劃上的錯誤，同時亦不再如過去硬性規定『趕上并超過美國』的年限。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大會開會之前不久，『少共真理報』曾刊載一篇論文，發表意見謂是否可以將集體農場改為五六家農戶的合作等語，此雖非正式的文件，然在蘇聯竟然可以允許發表這一類『離經叛道』的文字，便不是簡單的事，緣蘇聯私有土地僅佔可耕地約百分之三，但生產的穀物牛乳，竟達百分之四十左右，蘇聯當局不想改善其病態經濟則已，如想真正改善，一、重工業的過分偏重，二、集體農場的制度以及三、利潤方式的刺激等，都是非要考慮不可的主題。二十三次大會雖尚未公開討論，但似已開始接近此類問題。

俄共領袖在第二十三次大會宣稱，史達林時代業已過去，這是真話，史達林主義產生，有其時代背景，無法可予以復活，但因史達林主義死亡後所自然產生的自由主義思想，俄共當局自決不能讓它蓬勃發展。觀夫第二十三次大會中俄共對西方共黨代表團對蘇作家判刑事詰問時所作的辯護，可見一斑。

『美蘇合作，包圍中共』，或是過份之辭。中共責蘇對美『小罵大幫忙』，亦不無原因。今春塔斯干協定的訂立，與中共的國際政策背道而馳，而大大博得自由世界若干輿論的讚許。此次大會中，俄共雖亦譴責美國對越政策，但却一再強調與不同制度的和平共存、和平競賽與和平合作。相信最近的將來，莫斯科的外交路線，將一仍舊貫，不致有多大改變。

王啓升先生：

俄新五年計劃的農業不可樂觀

本人對此次學術座談會，有下列幾點膚淺意見：

第一、改第一書記為總書記的問題：俄共中央第一書記與總書記，同為俄共中央委員會的組織核心，在權力領導上，並無多大的顯著的差別，從這個角度來看，改第一書記為總書記，原則上實無任何意義。不過總書記是史達林長期統治蘇俄所擁有的頭銜（從一九二二年四月迄一九五二年十月），而第一書記則為黑魯曉夫統治蘇俄十一年期間（從一九五三年九月迄一九六四年十月）所戴的「皇冠」，現在布里茲涅夫唾棄黑魯曉夫的「皇冠」第一書記，而仍用史達林的舊頭銜總書記，這是否意味著捧史抑黑呢？

第二、俄共經濟計劃的年代，不管如何規定，五年？抑七年？二者均為俄共控制全國物質財富與奴役壓榨人民的全面統制的經濟制度，彼此是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五年計劃為史達林時代的產物，七年計劃則是黑魯曉夫當權時的傑作。現布里茲涅夫與柯錫金唾棄七年計劃名稱，仍沿用史達林「五年計劃」舊名稱，這是否亦意味著捧史抑黑呢？

第三、蘇俄在七年計劃期間既能建設五千五百所（或項）巨型工廠企業（或重大工程），又能在美俄太空競賽上作遠征月球的壯舉，像這樣擁有高度科學技術的工業強國，蘇俄目前為什麼連人民日用必需品都無法滿足。據布里茲涅夫三月二十九日報告所透露的資料，稱過去五年「甲類」工業增長率為百分之五十八，而「乙類」工業增長率為百分之三十六，這說明在生產增長率方面，過去五年後者落後於前者百分之二十二。消費資料的生產增長率既落後於生產資料生產增長率百分之二十二，所以過去五年蘇俄人民所需要日用必需品就無法得到滿足。布魯又講，今後五年「甲類」工業增長率定為百分之四十九至五十二，而「乙類」工業增長率提高為百分之四十三至四十六，後者低於前者為百分之六，這說明今後五年蘇俄人民所需要的消費資料雖有所增產，但蘇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政策和偏重於國防工業的政策，並未放棄，仍在繼續實施。

第四、蘇俄最近幾年的農業，是完全失敗的。一九六五年的農業產量，

蘇俄除公佈籽棉爲五百七十萬噸外，糧食產量亦僅爲一億二千零五十萬噸。一九五九年蘇俄糧食產量爲一億二千五百九十萬噸，這可以看出七年計劃最後一年（一九六五年）的產量，比七年計劃最初一年（一九五九年）的產量，尙少五百四十萬噸，這說明七年計劃期間的蘇俄農業是每况愈下的，這是蘇俄奴役農民集體化暴政所造成的惡果。如果該項暴政不根本廢止，得不到農民的合作，預測蘇俄新五年計劃的農業，亦不可樂觀。

主席結論：

今天我們的座談會對於俄共大會的分析，確實收穫不少。現在兄弟想就各位的發言，歸納成下列幾點：

第一、誠如各位所言，俄共舉行第二十三次大會，有一個特別的背景。蘇俄從今年一月起正式推行經濟改革，我們可以看出來它是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之下，召開這一次大會。就政治的意義來說，它的對外關係，一方面是要避免核子大戰，但是一方面又不得不準備戰爭，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同時在共產集團的內部，它一方面是希望能夠恢復團結，但又沒有辦法與共匪之間取得協調，所以蘇俄是在一個雙重的政治矛盾之下，舉行這次的代表大會。

再次是它在理論上一方面不得不繼續強調黨的鬭爭性和革命性。但事實上俄共黨員的成分，有了基本的質的變化。因此今天它要適應這個新的環境，要求政治經濟各方面的配合，謀求對內的團結與對外的和平。在表面上看起來是溫和的，但實質上共產黨就是共產黨，所以無論它在策略上是一個大的變化也好，被視爲是平凡也好，事實上它本身所包含的危險性仍然繼續存在。

第二點是關於它的組織和人事問題。有關政治局的恢復及第一書記改成總書記，許多位先生提出了意見。大家幾乎有一個相

同的看法，即今天俄共的領導人，希望將現在的集體領導，逐漸的能過渡到或恢復到過去的個人獨裁。所以先要有個核心組織，由極少數人透過黨的機構加強對黨的領導和控制，俾能適應未來的一種大的變化。不過，欲達到此一目的是很困難的，因為既不能一下就取得個人獨裁地位，而在另一方面黨的基層社會基礎也已經有了變化。

第三點是關於經濟的部份。剛才幾位指出蘇俄的國民所得是增加了，但是生產工具缺乏、勞力過剩，似有失業現象。新的五年計劃仍然是着重國防工業，同時注意輕工業和農業方面的發展。單從經濟方面着眼，蘇俄今天所採取的政策可能是對的。但是也有兩個問題，第一是國際情勢的緊張，在未來的五年之內，能否保持鬆弛的局面。第二是共產統治制度的本身，不能不依靠暴力來統治，因而他們所標榜的改善人民生活，注重輕工業與農業發展，可能還祇是一個幌子。過去黑魯曉夫在一九六四年也曾這樣號召，結果還是挽回不了蘇俄所面臨的危機。

關於蘇俄對外政策：剛才孫先生已有詳細報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蘇俄開始重視「臺灣」地位的增長，同時又提出所謂新的功利主義。這個所謂新的功利主義也可以說是今天國際上的強權政治，俄國人拿它來批判西方國家，說是新的功利主義或強權政治。這正可反映當前整個世局的一個焦點。當然基本上俄共仍然是標榜和平共存，對共匪而言則不會採取一種激烈的手段，公開和共匪分裂。今天座談的問題涉及的面很複雜也很廣泛，各位先生所提到的意見很多。由於時間所限，希望沒有發言的各位先生，能夠給我們一個書面的意見，在下月的問題與研究發表，今天就隔各位很多的時間，特別謝謝。

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書記



馬祖洛夫
中央政治局委員



柯錫金
中央政治局委員



基里林
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書記



沃洛洛夫
中央政治局委員



布茲里涅
中央政治局委員
總書記



謝列平
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書記



蘇斯洛夫
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書記



波瓦基斯
中央政治局委員



包戈尼
中央政治局委員



貝爾謝
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黨監委委員
主席



馬雪洛夫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庫那耶夫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達米契夫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格里辛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謝列托斯
中央政治局委員



安德洛波夫
中央書記



謝爾比茨基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烏斯季諾夫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中央書記



希拉多夫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姆沙哈瓦那澤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西索夫
中央檢查委員會主席



魯達可夫
中央書記



波諾馬廖夫
中央書記



庫拉科夫
中央書記



卡比托諾夫
中央書記